

· 学术述评 ·

世界格局、“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

——第九届世界社会主义国际论坛综述

《世界社会主义动态》编辑部

第九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于2018年11月2日~3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主题是世界格局、“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王京清同志出席大会并做了题为《在改革开放伟大革命中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新篇章》的主旨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同志做了题为《科学判定时代方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充满信心》的主旨发言。论坛收到论文三百余篇，来自国内外的二百余位专家学者和理论工作者与会。

当前中国所处的时代方位

正确回答和准确把握时代问题是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世界格局、充分认识推进“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前提。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曾阐述过这个问题。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与会人员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1. “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

2017年9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学真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

与会人员一致赞同习近平总书记的上述论断。李慎明研究员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们所处时代这一判断不仅完全正确，而且十分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朱佳木研究员认为，当今世界同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所处的时代相比，虽然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仍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指明的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

· 74 ·

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就是唯物史观大的“历史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民族与宗教事务委员会主任王伟光指出：“唯物史观大的‘历史时代’是指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形态所历经的整个历史进程，该历史时代的进程从该社会形态取代前一社会形态在人类社会占据统治地位起，历经兴盛、衰落，直到为下一社会形态所取代而不再占据统治地位止。马克思恩格斯按照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演变理论，根据‘经济的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来划分历史时代，把历史时代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等历史时代，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过渡，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时代。从时代的根本性质和大的历史进程来看，从全球范围来讲，现在仍然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又是经过社会主义过渡，最终取代资本主义而进入共产主义的历史时代，该时代充满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斗争。”

唯物史观大的“历史时代”也就是“大时代”。李慎明认为，习近平总书记讲的“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说的大时代，又包括列宁说的帝国主义这一特定的小时代。这里的大时代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时代，小时代即列宁所说的帝国主义时代，也就是资产阶级逐渐步入寄生、腐朽、反动和没落的历史阶段，或者说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李慎明指出：大时代与小时代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于当代世界社会发展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今世界仍处于帝国主义时代，处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代；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李慎明强调：我们只有看到这一点，才能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和帝国主义的本质，深刻把握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 and 趋势，深刻理解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上所发生的各种主要事物的本质。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判断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判断是我们观察世界格局的重要方法。中共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认为，如果对当前世界处于什么时代的问题认识不清楚，对世界格局就不会有正确的判断。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金民卿研究员指出：时代本质形成重大时代问题，决定世界基本格局，影响人类生存现状和发展前景；当今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当今时代的阶段性特征是什么，当今时代的世界基本格局和发展趋势怎么样，当今时代人类面临什么样的重大挑战，如何破解上述重大时代难题并引领世界走向更加光明的前景，构成了“世界向何处去”的重大时代之问。金民卿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判断，以深刻的哲学思维、宽厚的人类情怀、强烈的时代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对“世界向何处去”这个重大时代之问进行了深度的哲学剖析和系统的理论回答，全面揭示了当今时代本质及其必然趋势、当今时代特征及其重大问题、当今世界格局及其发展走向，提出了一系列关乎世界发展和人类命运的重大理论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判断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我们所处时代的判断向我们提出了一些新要求，其中主要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认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和曲折性，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李慎明认为，我们划分时代的依据是唯物史观，我们所处的时代决定了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马克思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结论。李慎明指出“两个必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总归宿，是我们正确理想信念的总源泉、总依据，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心的根本所在“两个决不会”是人类历史总体发展的具体过程和具体细节的总汇集、总描述，是我们实现最高纲领的过程中，在制定、实施和实现一个个最低纲领和一个个战略策略时，所要考察的客观的具体条件的现实依据。李慎明认为，时代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时时刻刻存在于我们现实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之中，存在于我们亟待统筹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之中。

我们要充分把握时代特点，掌握社会发展规律和时代发展趋势，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李慎明认为，现在继续使用列宁的“金融帝国主义”这一提法，有助于我们更直接、更深刻、更透彻地认识帝国主义和世界各种主要事物的本质，有助于找到科学应对的战略举措。李慎明强调：从总的历史趋势讲，在战略上和本质上，资本帝国主义无疑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纸老虎，但这不排除其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因而在战术上看金融帝国主义又是真老虎、铁老虎，真老虎、铁老虎是要吃人的；只有认清金融帝国主义既腐朽、垂死又可以在特定条件下以惊人速度发展这一重要特征，我们才可能保持头脑清醒，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赢得主动。李慎明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讲，弄清楚时代问题，对我们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否定当今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的时代，而是直接或间接肯定这一时代的本质未发生改变。

3. 当今“金融帝国主义”的特征

当今的“金融帝国主义”亦称“新帝国主义”，与列宁当年阐述的“金融帝国主义”有很大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首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主席团成员程恩富论述了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程恩富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新帝国主义阶段，其特征集中表现在五个方面。第一，生产与流通的国际化和本国集中的强化，形成富可敌国的巨型垄断跨国公司。为数不多的公司帝国已经掌控了全球经济的大动脉，成为左右全球经济社会向何处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第二，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形成并在全球经济生活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新帝国主义时代的最显著特征。跨国大银行等金融机构控制着全球经济命脉，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进行掠夺式积累，生产逻辑让位于投机逻辑，经济金融化畸形发展。第三，美元霸权和知识产权的垄断，形成不平等的国际分工和两极分化的全球经济与财富分配。新国际分工仍然在延续着不均衡、不平等的结构体系，不平等的国际交换导致两极分化的全球经济和财富分配持续扩大，跨国公司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力量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得到强化。第四，“一超多强”结成的国际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形成内

外剥削和压迫的金钱政治、庸俗文化和军事威胁的经济基础。“G7 + 三大支柱”组成国际性垄断经济同盟，以北约为主体的国际资本主义垄断军事同盟，以普世价值形式出现的文化霸权，“一超多强”结成的国际资本主义寡头垄断同盟，大大巩固了美国作为世界经济军事霸主的地位。第五，全球化资本主义矛盾和各种危机时常激化，形成当代资本主义垄断性和掠夺性、腐朽性和寄生性、过渡性和垂危性的新态势。新帝国主义是产业高度空心化的资本主义，是经济停滞常态化的资本主义，是债务驱动的资本主义，是过渡和垂危的新型资本主义。

尽管“金融帝国主义”的特征发生很大变化，但列宁关于时代的判断在今天看来依然是正确的。李慎明认为，有些人对列宁关于时代的判断提出诘难，这是因为他们理解上有褊狭和过错；金融帝国主义时代还可能会持续几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因而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代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逆转；在上述过渡过程中，社会主义革命有迅速发展时期，也有消沉时期，这种现象既会在一国革命中发生，也会在世界范围发生，因而不能把当前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处于消沉时期的现象看成是时代的根本性质改变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和平龟行发展”的“政治消沉”时期必然会结束，“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一定会到来。李慎明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主题”和“共商、共建、共享”这“三大发展理念”等中国智慧和方案，正是我们在所处时代条件下着眼人类发展和世界前途、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举措。

中方学者关于时代本质的看法得到了国外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在大会发言和分组讨论时，当中方与会人员讲到这部分内容时，博得了国外与会学者的热烈掌声。国外与会学者纷纷表示，将把这一观点带回他们所在的党进行学习和讨论。

当今世界格局与社会主义态势

一般说来，世界格局指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国际舞台上由于相互制约而形成的比较稳定的结构状态。世界格局的稳定是相对的。当今世界格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体现在什么地方？处于世界格局中的社会主义呈何态势？怎样看待目前中国与美国的关系？与会人员就上述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 当今世界的总体格局及其挑战

进入 21 世纪以来，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题，也是世界的总体格局。李慎明指出，由于世界各国人民对和平有强烈的愿望和追求，对帝国主义的认识逐步深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正处于衰退中，世界多极化也在深入发展，美国称霸全球常常力不从心，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对其他发展中国家搞“颜色革命”，世界和平的整体格局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朱佳木认为，当今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各国之间的联系比以往更频繁、更紧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世界多极化、

经济全球化仍在深入发展，各国的相互联系、依存关系更加紧密，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联合更加广泛，战争因素被和平力量继续扼制。国防大学原政治委员赵可铭上将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历史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强劲。

与此同时，当今世界也面临诸多挑战，人类正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大国和地缘政治摩擦博弈局势错综复杂的时代。朱佳木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无法克服，垄断资本与国家力量还在进一步结合，世界范围的贫富两极愈益分化，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挑战和风险更加严峻，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气焰更加嚣张，各种传统、非传统的安全威胁更加强烈，发达国家内部的民众抗议活动和最不发达国家及战乱地区的移民潮、难民潮持续发酵，贸易保护主义迅速抬头，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开始滋生。赵可铭指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金融危机阴云不散，发展差距和失衡的鸿沟日益突出，局部军事冲突时有发生，单边主义、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澳大利亚共产党中央教育委员会成员、澳共党报《卫报》主编安娜指出：“经济指标表明，下一次全球金融危机迫在眉睫，各国经济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难以负担且不断增加。在全球经济尚未完全从2008年至2009年金融危机和随后严重衰退中恢复的情况下，金融资本增加对资本投资和政府的控制。世界上有119个发展中国家陷入严重金融困境，破产威胁迫在眉睫。有些国家已经无力偿还其主权债务。”

《文汇报》高级记者郑若麟研究员认为，当今世界正在形成“四大力量板块”、“三大冲突”。“四大力量板块”指美国本土产业资本、支持全球化的西方跨国金融资本、伊斯兰世界和中国。“三大冲突”指美国本土产业资本（包括支持特朗普的美国中下层劳动阶层）与跨国金融资本在全球化问题上的冲突，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以及复兴中的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的冲突，其核心是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特朗普主要代表美国本土产业资本（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遭到损害的劳动阶层和部分中产阶级）势力，其主要对手“金融跨国资本”“挟天子以令诸侯”——“天子”就是反对特朗普的那部分美国势力，“诸侯”则是欧洲、中国、日本等支持全球化的力量。特朗普代表美国产业资本势力向跨国金融资本发动了以“反全球化”战略为标志的全面进攻，双方正围绕支持还是反对“全球化”展开激烈博弈，中国与伊斯兰世界分别由于贸易、难民和移民等问题冲击特朗普“反全球化”战略而卷入其中。“特朗普的美国”与“金融跨国资本”的争斗才是“三大冲突”中的首要冲突，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冲突、正在崛起的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的冲突特别是当前的贸易战并非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矛盾。

2.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力量的消长

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是当今世界的两种重要力量，其力量对比的消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世界格局。李慎明指出，世界上两大社会制度竞争和斗争的态势与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仍面临着巨大挑战。赵可铭指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垄断资本操纵下，全球区域发展差异日益扩大，全球贫富差距鸿沟难以弥合，全球治理体系在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遭遇信任危机。与此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包括中国、古巴、老挝、朝鲜、越南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则在吸取了苏联东欧剧变和过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后，陆续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变革或革新，从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各社会主义国家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新的提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正走出低谷，逐渐迎来复苏的前景。”兰州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迟方旭博士认为“从世界格局着眼，我们的确必须客观地承认，当今世界西强东弱的格局尚未发生根本改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总体仍处于低潮时期。于是，以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为代表的法学思潮不仅畅行西方，在东方包括中国仍不乏信奉者、追随者和倡导者。”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带动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出低谷。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李霞认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东欧剧变导致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随之陷入空前低谷。经过三十多年的恢复与调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改变了当今世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力量对比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使人们看到了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振兴的希望。”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忠军指出，从国际政治格局来看，具有鲜明的“东升西降”的特征，世界政治经济的中心开始向亚太转移，尤其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其对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对国际力量对比产生重要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周森认为“美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力相对衰退，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正在群体性崛起，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整体力量在增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重要的力量，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李慎明指出“当今时代的金融帝国主义无疑已经开始处于衰败之势。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的危难，就是社会主义的机遇。危难越多越大，机遇也就越多越大。只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然屹立，则极有可能进一步引发自资本主义诞生500年来最大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总爆发。”

无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力量发生怎样的变化，它们之间的根本对立关系是不会改变的。张全景强调“当前世界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在美国与中国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时刻‘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没有丝毫改变。”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周新城指出“应该看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本质上是对立的，它们之间是一种取代关系：或者按照社会发展规律，社会

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或者在特殊的阶级力量对比条件下，社会主义制度倒退到资本主义去，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趋同、相互融合，这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客观上是不可能发生的。自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出现社会主义制度以来，帝国主义始终把消灭社会主义当作根本的战略，妄图恢复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院长吴文新教授认为，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性、地域性极为突出，却是嵌合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地域性社会主义，是在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互作用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民族的社会主义逐步转换为世界的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极可期待、极具价值的历史进程，必将推动人类社会朝共产主义方向进步，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向全人类贡献“中国方案”的世界意义。

3.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变化

近年来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美均是世界上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国，两国关系被普遍认为是 21 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世界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的力量。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指出：“‘时间不多了’、‘30 多年来从未遇到过的最悲观、最消极的时刻’、‘美国的耐心已到尽头了’、‘美国政府对各种对话与交流已受够了’，在美国的五天交流中，几乎每场活动都能听到类似声音。的确，与此前诸多舆论的判断一致，目前中美关系正在遇到建交以来最复杂、最恶劣、最综合的寒流，远甚于 1989 年美国对华制裁、1999 年美国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美方的观点认为，后者仅是聚焦在个别领域、个别事件，现在则是全方位、全社会的对华不满、质疑、批判甚至否认。”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D. G. 诺维科夫指出：“美国日前对中国进行贸易战并企图对其封锁高科技市场。西方媒体对中国开展信息战，并企图挑拨和破坏中国与其伙伴的关系。他们谴责中国实施对外扩张、侵害人权。在俄罗斯有一种说法：在大声嘲笑别人眼睛里的沙子时，却没有看到自己眼睛里的木头。”

表面看，中美之争主要围绕经济问题展开并被普遍称为“中美贸易战”，但实际牵涉的问题远超经济贸易范围。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党委书记、研究员倪峰认为，中美两国是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战略利益都存在差异的国家，这种差异造成了两国之间始终都存在着战略互疑，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周森认为：“中国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推动国际格局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出于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本性，西方国家对中国有着深深的意识形态、制度偏见和战略疑惧，崛起中的中国遭遇西方霸权国的遏制、打压越来越激烈和公开化。美国和西方的金融垄断资本体量巨大、危机深重，只能靠瓦解和控制一个大国才能汲取‘战略红利’，才能为其天文数字的金融泡沫买单，中国改革开放中积累的巨量财富是其理想目标。”古巴哈瓦那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格蕾蒂斯认为：“从本质上讲，当今中美争端的核心已经超越了经济领域。两国之间的争端不应脱离当今时代最重要的矛盾而单独分析，必然与联合国和其他国际机构的争端有关，与欧洲、拉丁美洲、非洲甚至亚洲等不同地区的利益有关，或与中国西藏、中国台湾、中国南海的争端有关，或与朝鲜地区冲突的不确定因素有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

研究中心教授张文木认为，新时代中美关系的竞争本质是制度竞争，特朗普政府将自己的政治基础从以往的石油美元移至军工美元，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世界和平成了美国的敌人，美国外交的目标再次回到战争的轨道；在国际资本收益面临严重萎缩的今天，美国对中国的无理索求已严重逼近中国的底线，双方妥协的余地越来越小，“和平与发展”（尽管值得争取）的空间迅速收缩，世界再次提出战争与和平的话题。

中美关系变化的原因值得深入分析。倪峰认为，在中美关系演进过程中，虽然会不时出现如特朗普现象等“非常规因素”并对两国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但一些常规的、基础的因素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更根本、更长远。所谓“常规因素”，指对中美关系不断向战略竞争方向滑动一直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也就是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及其相互认知的快速变迁。常规性因素和非常规性因素在2017年底实现汇集、聚变，其产生的巨大动能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强烈冲击。王文指出：“美国对华态度正在进行建交40年来最具颠覆性的反思，源于中美实力正在出现本质性的消长。‘美国将弱不弱、中国欲强未强’的关键节点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仅是贸易关税进一步加征，南海、人权、台湾、新疆、互联网、金融、安全、高科技等诸多领域的中美冲突，极可能会出现集体爆炸，稍有处理不慎，便会导致两国全面对抗，建交40年基业被彻底颠覆的可能性并非为零，全面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概率也并非为零。”朱佳木指出：“中美贸易战今后无论打出什么结果，美国对中国的新遏制政策短时间是不会改变的。这种遏制虽然会给我们造成某些损失，但阻挡不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相反，只会起到提高人民觉悟、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壮大中国综合国力的作用。”

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作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迅速发展并取得巨大成就，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赞誉。在进入新时代的今天，如何继续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这是与会人员热议的话题之一。

1. 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转变的历史时刻开始，在世界格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过程中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王京清指出：“与中国改革开放同时开始的，有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改革使其暂时摆脱了危机、实现了短期发展，但后来又陷入了新的危机；有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导致了这些国家的制度颠覆和国家分裂，即东欧剧变；还有一些其他不同制度背景和民族特点的改革探索，但大多都没有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繁荣。”王伟光认为：“东欧剧变既有资本主义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因，也有本国复杂多方面的内因。譬如，脱离本国实际，超越了世情国情，忽略相对于西方诸发达资本主义国

家落后的生产力，忽略市场经济的必要性，逐渐形成了不适应的经济政治体制，束缚了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束缚了人民积极性的调动，束缚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从而陷入了发展困局，发展速度先快后慢，以至逐步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王伟光指出“为了解决发展中的问题，只有改革一条出路。然而由于苏东诸国采取了错误的改革路线，走上了资本主义邪路，最终酿成悲剧，这是苏东失败的直接原因。但最根本的内因是苏东诸国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丢掉了党的领导、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与上述改革不同，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的缘由在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王京清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个性特征：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始终不渝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始终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确道路，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立足中国具体实际，始终科学把握时代主题、吸收一切优秀成果、积极为人类发展做贡献，始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走“渐进式改革”之路，始终勇于自我革命和纠错创新、实现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良性互动，始终牢牢坚持政治原则底线、指导思想底线、人民利益底线和国家利益底线。南非共产党第二副书记克里斯·马特哈科强调“仔细阅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代表大会的文件，可以看出中国之所以取得显著的进步，正是因为中国所走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道路不同，中东欧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被推翻了，恢复了资本主义。同时，中国也没有重复熟悉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斯大林时期开创的、被广泛推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巩固政权时采用过的苏联模式。中国所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自身条件的发展模式。”格蕾蒂斯指出“历史证明，先前对中国的假设是错误的。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已经站起来了，但没有加入新自由主义思潮，至少没有以分析人士和北美政客倡导的那种形式加入。相反，中国深化、加强了独立性特征，正是这些特征使其能够在国际关系中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这一现实促使北美政治不同部门就遏制中国的必要性达成了共识。”

中国在改革开放中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王伟光指出“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最重要的是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动摇，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动摇，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马福运指出：“把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统一，这是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功经验之一，也是从邓小平到习近平始终坚持的改革逻辑；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不变’，与革除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弊端之‘变’的辩证统一，是推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保持社会主义生机活力的重要经验，也是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完善与发展的基本前提。”克里斯·马特哈科指出“根据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的预测，在今后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100多年来一直保持的领先地位将被超越。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言，这将是一场巨大的挑战。在经受了相当多的破坏性挑战后，中国似乎决定不再重复这些挑战，而是有计划地、有保障地、稳定地发展。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在迄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计划在全球范围内

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会的越南和老挝学者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给他们很多重要启示，他们各自的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中国 40 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教训，以更好地为他们各自的革新事业服务。老挝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乐彭博士说，老挝实行全面革新政策，从包产经济机制、集中计划、按均分配到市场经济体制，从 1986 年到现在，老挝经济已经有了较好的发展，年经济增长速度加快，各经济成分发展迅速，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人民生活得到了逐步的提高，对近年来的经济跳跃式发展贡献了力量。

2. 改革开放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提出的时代课题

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并回答了我们所处历史时代的课题。王伟光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所处时代的历史最强音，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指出了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过渡，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历史趋势，从而回答了最为迫切的时代课题。”王伟光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回答该时代课题，主要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关于为什么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通过什么样的途径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二是关于在什么样的具体条件下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条件最终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问题。”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诸国同时胜利的结论，建立在对社会历史一般发展规律的判断上。

通过对东方相对落后国家的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新的观点。王伟光指出，后来的实践超出了他们的预判，促使其研究东方相对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并得出在特定条件下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实现社会形态的跨越式发展，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这样一来，他们就把相对落后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最迫切的时代课题提了出来。当时东方相对落后国家一种是俄国类型（虽然已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仍然落后，留存大量的封建残余，是垄断资本主义统治链条上的薄弱环节），另一种是中国类型（尚未进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工人阶级人数较少，处于更为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这两种类型又分为两步：在相对落后国家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可以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第一步；革命成功后，建设社会主义又是第二步。王伟光认为“列宁只解决了第一种类型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尚未解决第二种类型国家爆发社会主义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更没有解决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建设社会主义的第二步问题。”比俄国更为落后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苏联改革失败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回答这个重大课题的时代使命落在了中国这个东方落后的大国肩上，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破解了这一重大时代课题。王伟光指出，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设想，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

社会主义制度，但资本主义已经历的市场经济充分发展、生产力高度成熟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不可逾越的。中国共产党人总结了社会主义诸国家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其中包括中国自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通过改革开放建立与中国社会主义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回答了在落后的国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成功地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完整地回答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时代课题。

中国成功破解时代课题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有重大启示。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委员、胡志明国家政治学院新闻与宣传学院教授阮明环指出“对于越南，自从进行革新事业以来，为保证经济领域的社会公平与发挥民主，首先要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定向的市场经济。实践已经证明，经济革新成就是基于不断完善越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从而保证实现社会公平和发挥民主，创造‘机会’和‘条件’——可理解为保证每个公民的平等与固有自由权——让人民按照自己的能力参与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并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成果。”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全面深化改革

当代中国发展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方位上，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王京清认为，这是一个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梦想。王京清指出，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必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要求我们必须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方略，不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事业。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我们党制定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科学规划了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全面制定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部署。王京清认为，为了把这些基本方略和战略部署落实到位，我们一定要牢牢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快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力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王京清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就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动经济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

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责任编辑: 李 正]

· 学术述评 ·

世界格局、“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下）

——第九届世界社会主义国际论坛综述

《世界社会主义动态》编辑部

第九届世界社会主义论坛于2018年11月2~3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主题是“世界格局、‘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王京清同志出席大会并做了题为《在改革开放伟大革命中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新篇章》的主旨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同志做了题为《科学判定时代方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充满信心》的主旨发言。论坛共收到论文300余篇，来自国内外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和理论工作者与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的国际影响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不仅改变了中国，也在国际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的结合，与会专家学者就此表达了他们的看法。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

与会专家学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一致表示肯定。王京清指出“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不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还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人类社会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经过40年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国际地位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华民族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郭锐指出，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有能力向世界提供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公共产品，使世界游戏规则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表现，也是中

• 66 •

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做出的贡献，顺应了世界人民对中国的信任和期待，在精神层面打破了西方所谓的“道义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就显著体现在经济发展方面。前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以创造性的劳动跻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正在夺取第一位。中国正在证明，资本主义是无法在政治上勒索社会主义的，因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已经足够强大。据悉马克思曾经对一个朋友说，只要有足够大的勺子，就可以把魔鬼掖进嘴里。”赵可铭指出“40年来，中国人民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一代人接一代人地艰苦奋斗、紧密团结、顽强拼搏，极大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推动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成功实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连续多年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了中国贡献。”倪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国土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而人口为其两倍的中國，正用自己特有的方式开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为宏大的现代化进程——短短30多年中国就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外汇储备比其他各国的总和还要多，钢产量超过全球其他十大产钢国的总和，已有210项工业产品位居世界首位——而且这一波澜壮阔的发展进程远未结束。俄罗斯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弗·格·布罗夫指出“改革开放40年后，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变成了强大、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经济潜力跃居世界第二，很多行业都以出口为导向。重点是，中国经济已经适应了全球化进程，而许多国家还没有做到。”

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促使其迅速崛起，国际上有些人对此感到担心和疑虑。北京体育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齐冰博士指出“西方国家一直担心中国会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所以认为中国是修正主义国家，甚至最近又扣上‘帝国主义’的帽子。即使中国一再强调是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他们仍深表怀疑。美国学者称这一现象为‘承诺疲劳’。西方一直认为，中国明明是大象，可是一直假装是兔子。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马凯硕也解释了西方将中国视为威胁的原因，他说‘如果你看到角落里一个小老鼠，你不会感到害怕，因为它不足以构成威胁。30年之后，小老鼠长成了大象，但房间并没有变得更大’。西方的确对于中国崛起表现出了不适应症。”他强调，一些周边国家尤其是历史上深受儒家文明影响的国家惧怕中国，他们仍认为中国是个帝国，既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便车，又在自身安全问题上依赖西方国家，经常被当作地缘政治中的棋子，为了本国的自尊经常强调“自由平等”，并且一些国家仍与中国有领土争议，所以建立周边命运共同体仍是问题。

2. 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

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共江苏省委党校教授彭安玉指出“中国通过之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积累起来的能量，已经能够单独或联合其他国家推动诸多议题，并且可以努力开创新的战略机遇。”弗·格·布罗夫指出“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政

治影响力也逐渐变大。目前,在各种国际论坛上都能看见中国代表的身影。没有他们的参与,就不可能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做出决策。”他指出,中国有巨大的投资潜力,可以提供大量的资金支持,“一带一路”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级工程,影响亚洲和欧洲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其实施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美国霸权统治的单极世界将消失,国际社会将呈现多极化趋势,并达到新的权力平衡。

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赵可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实践,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关注中国道路、希望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和组织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希望能找到可推广的有效范式。”周森指出:近年来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大幅攀升,也是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稳定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发展开创了一条崭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中国的和平发展正在深刻地改变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国道路的发展也为世界提供了一条文明型、和谐型、共享型发展道路以供借鉴,一些国外左翼学者探讨了中国在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的积极作用,寄希望中国能够走出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崭新的发展道路。吴文新指出,中国是全世界或整个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探路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以源自西方而又超越西方文明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实现的伟大的社会变革,“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势崛起和迅猛发展,更多面向发展中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国际大战略的实践,必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世界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将因而成为21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最为显著的影响因素,甚至可能成为引领性和主导性因素。”

中国的成就给世界社会主义的复兴带来了希望。埃贡·克伦茨指出“新自由主义者1990年过于草率地断言称:社会政治的根本性变革已经结束,资本主义已经统治全世界,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社会主义已经被最终击败。这种论断忽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纲领的存在,中国的发展给社会主义理想带来了新的推动力,其影响超出了中国的国境。”他还说“经过我对十九大党代会文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深入学习,我坚信,能够担得起人类进步先驱者称号的,在18世纪有法国1789年的大革命,在20世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在21世纪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仁不让。正如列宁及其同志1917年建立新国家的壮举一样,21世纪的中国事业同样堪称先驱壮举,同样具有决定性的国际意义。正因为中国对苏联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十分深刻的评价,所以我坚信,中国将不会重复我们在欧洲犯过的错误。中国的教材告诉我们:在1991年苏联解体和欧洲社会主义沦亡之后,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终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将对21世纪产生重要的国际影响力。”

3. 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实际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

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尽管国际上有人曾对此持有异议，但由于中国的快速发展和巨大进步，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新的理解。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主编安德烈·卡托内指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种解读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局限于一个严格的民族领域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仅适合中国特定历史的方案，而中国为促进本国发展把国际主义放在一边、弃之不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将发展成为一种形式的民族社会主义。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恶意的解读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解释成一个用来掩盖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道路的意识形态障眼法，中国人将成为民族主义者并将马克思国际主义丢进垃圾箱。”安德烈·卡托内就上述异议指出“这一解读没有考虑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阐述，他们并没有抛弃一般和国际工人运动。”弗·格·布罗夫指出“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式。当时，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等概念。人们应该记得，国际上加入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大都不认可这些概念，他们甚至指责中国共产党背离了普遍接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共产党的理论慢慢被证明是正确的。要想取得成功，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必须考虑本国国情，即具体社会经济和历史特点。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应该‘中国化’、‘俄罗斯化’等。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保了改革开放的成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更加坚定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心。张全景指出“苏联解体后，反动势力叫嚣‘历史终结了’、‘社会主义失败了’。但令那些‘终结论’终结的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积极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惊天动地的发展奇迹，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华民族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发展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的一个新的阶段，它将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吴文新指出“虽然还有仅存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古巴、越南、朝鲜、老挝等，都由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时的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先天不足，而呈现出不尽人意甚至无法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媲美的怪相和困境，但是毕竟在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上迈开了虽然颤颤悠悠但也坚定踏实的步伐。”埃贡·克伦茨指出“我们的经验表明：凡是不相信社会科学或不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人，就会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令人欣慰的是，中国领导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他们毫不动摇地将马列主义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指南针。我对他们的远见感到钦佩，中国领导人带着这样的远见迈出了社会发展的步伐，他们以这样的远见遵循着自己的战略目标，并切实地一以贯之。”吴文新认为“21世纪是人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和建设成就影响下、引领下进而主导下，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并在其直接推动下，由多元制度共存的‘世界社会形态’向全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和中华文明的世界历史意义在此过程中逐渐展现出来，真正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普世价值’逐渐形成强大的实践力量并广泛发挥作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一些与会专家学者就此发表了见解。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顺应人类发展趋势提出的。安德烈·卡托内指出“将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性质从一个超出国家范围的更广泛共同体（例如亚洲或欧洲共同体）转变为一个针对全人类的共同体是习近平主席的功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冯颜利教授指出，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揭示了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现实依据，系统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世界意义。安德烈·卡托内回忆说“习近平于2015年9月28日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即联合国成立70周年）上发表的讲话以一种清晰而组织有序的方式介绍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提议。通过对这一具有非凡和重大意义的讲话展开分析，我们能够捕捉到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说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特征。我们还能够确定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与其他可能具有相似或相近意义的概念之间的基本差异，例如‘和平共处’（在1950年至1960年期间得到广泛传播）和‘相互依存的世界’。”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原副政委李殿仁教授指出，随着全球化的开启和演进，人类居住的地球变小了，相互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共同利益、责任、命运联系更加紧密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大势所趋、历史必然。赵可铭指出“今天，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尽管人类还远未达到‘自由人联合体’那种理想境界，但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命运与共、人类社会休戚相关早已成为客观趋势，在金融危机、难民危机、疾病传播、气候变化的宏大命题前，没有人独自应对、独善其身。”李殿仁分析说“随着全球化的演进，整个世界在经济层面基本上都联系在一起了，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但是，这只是单一层面的经济利益共同体，是十分脆弱的，会因为国家之间在安全、政治等方面的利益冲突而解体。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各国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依赖度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人类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具有全局性、综合性和长远性，比如核灾难、传染病、气候变化，再比如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整

个人类，不管何国何族，恐怕是欲存俱存、欲亡俱亡。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人类已经命运与共。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实然的事物。与利益共同体相比，命运共同体已经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共同命运已经远远超越共同利益，它是不可交换的，共同体内的成员已经生死与共、荣辱与共。”安德烈·卡托内指出“为了将世界转变为一个具有强劲活力和积极主动的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具体而切实可行的道路。命运共同体提议的范围更为广泛，是一个广泛的世界转型战略，从文化和精神等多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整个世界。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指南针，可以指导共产党、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者和进步力量的行动。命运共同体是推翻剥削、饥饿、苦难和落后的世界统一战线。”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扬弃。D. G. 诺维科夫指出“国际关系的阶级结构就是一座地缘政治金字塔，处在塔顶上的一个超级大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全世界，一旦有人敢与其政策相左就会采取包括制裁、经济封锁、‘颜色革命’到公然干涉等一系列惩罚性措施，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对这种国际关系的阶级结构的否定。”赵可铭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统治之下，我们不得不面对经济发展区域失衡、贫富鸿沟日益扩大、生态资源难以为继、各种矛盾冲突此起彼伏的局面，这种片面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和失衡的全球治理体系已经千疮百孔，这种治理体系在霸权主义、恐怖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遭遇了信任危机“中国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对之加以扬弃，主张全面发展和共同发展，以解决发展失衡、治理困境、数字鸿沟、公平赤字等问题，主张各国主权平等、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以真正做到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逐步实现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罗曼诺夫指出“中国国家领导人强调人类所面临的道路选择的重要性：一条道路会让人类为争权夺利而动用武力，而很可能导致毁灭性危机的出现；另一条道路则引导人们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共同应对挑战，开展全球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良好条件。我们要抓住历史机遇，做出正确抉择，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罗叶丹从分析资本主义后工业阶段的生产特征出发，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适应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而提出来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走出当代资本主义全球化危机的现实出路。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最新成果。李慎明指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创新性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在 21 世纪的发展与传播增添了强大生命力，是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的新的重大理论贡献和实践推动，必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写下光辉灿烂的一页。”安德烈·卡托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是马克思国际主义和普遍主义在 21 世纪的体现，其概念比国际工人运动历

史中出现的诸如‘和平共处’、‘相互依存’等内涵更广、更具战略性。……‘和平共处’概念将人类划分为对立的系统，因而并没有制定人类统一的目标。出于这一原因，‘和平共处’概念并未考虑人民、文化和经济之间的动态互动。这种理论将世界划分为多个阵营、反对战争，却无法实现世界统一。”他进一步分析说“习近平设想了一个尚未实现社会主义却成功摆脱了侵略性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这是一个处于世界转型过程中的社会，公私企业共存，但目的是消除贫困和尊重所有人民的独立性。这是一个非凡的战略项目，符合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及其所描绘的人类未来。尽管世界在短期内无法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命运共同体概念中提出了一个人类团结一致的过渡阶段。命运共同体与地缘政治概念截然不同，地缘政治仅关注权力之间的关系（分享世界权力或者在世界大国之间分配权力）。”李殿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我们处理对外关系、加强同世界各国合作的基本遵循，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人类谋求幸福的共同愿望，也是人类休戚与共的责任担当。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自由人联合体”、人类解放思想有渊源关系。赵可铭提出，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就是一个“自由人联合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冯颜利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有丰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认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他们曾提出与“虚假的共同体”相对的“真正的共同体”，而“真正的共同体”即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盐城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马荣博士认为：“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世界历史的命题，其中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在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民族内部实现，而是在整个人类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虽然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直接来源，但据以提出共产主义理想的现实基础与我们今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现实基础是同一个基础、同一种趋势。”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项国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分析商品运行的规律，揭露了资本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提出人类解放的理论，这一理论包括政治解放、社会解放和人的解放，其中政治解放是前提，社会解放即生产力解放是基础，一切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最终目标。项国兰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意义在于双重解放，既是压迫阶级、国家和民族的解放，也是被压迫阶级、国家、民族的解放——“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不设假想敌、不针对第三方、具有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是从结盟或对抗的窠臼下解放出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观念，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安全之路，是从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威慑、遏制别人的安全观下解放出来；倡导合作共赢，是从独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的解放；不同文明和谐共处、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友谊是从‘文明冲突论’或‘文明优越论’观念下的解放；坚持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项国兰强调，这些理论为被压迫国家、民族和阶级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使他们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形成互相尊重、平等

互利、共建共享共赢、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伙伴关系，这将极大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并解放生产力，从而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

有的学者还探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李霞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毛泽东对外开放思想在新时代的升华，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冷战思维以“阵营”划线的超越。西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跃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具体运用和经验总结，蕴含着深厚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民情怀和世界大同的思想，体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远大智慧。”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吴克明教授认为，毛泽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提出了诸如奉行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坚持平等互利，开展对外交往；倡导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等理论和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对加强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途径

坚持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全球化新理念。D. G. 诺维科夫指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为基石的国际关系不再是竞争和强权政治，而是团结、合作和互助，这使得解决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问题成为可能。”李慎明指出，共商、共建、共享三大发展理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内容，坚持这一思想在当今世界乃至人类文明史上都有着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冯颜利认为，在全球生态、国际和平、全球治理、构建公平正义新秩序等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的“国际版”，是国内发展理念在国际战略中的反映。吴克明指出“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才能共同应对各种安全挑战，共同建设和平世界。繁荣发展是人类的永恒追求，打破发展瓶颈、缩小发展差距、共享发展成果，是各国面临的艰巨任务。只有实现各国之间的联通，才能推动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打造甘苦与共、命运相连的命运共同体。”

建立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大家庭式关系。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符豪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希望在日益失衡的国际秩序中尊重彼此，求同存异，凝聚最广泛的发展力量共同推进世界进步；就是希望在冲突日益频繁的局势下认清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和谐普惠，为文明发展提供稳定安全的世界环境；就是希望在单边主义日益盛行的‘丛林法则’中重塑合作共赢的思想，互惠互利，在广泛协作中实现利益多赢；就是希望在资源环境日益短缺恶劣的情况下绘制蓝天白云，以人类的长久繁盛为出发点，造就更美丽更宜居的‘地球村’。”习近平在阐释“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时说“人类命运共同体，顾名思义，就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前途命运都紧紧联系在一起，应该风雨同舟，荣辱与共，努力把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这个星球建成一个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李殿仁就此指出“以‘大家庭’来形容人类命运共同体，比‘地球村’更能说明世界各国各文明之间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关系。大家庭里，任何一个成员遭受灾难，其他成员都会感到痛苦，都愿意伸出援手；任何一个成员有了好事，其他成员都会高兴，都愿意分享快乐。每位成员不管能力大小如何，个人偏好怎样，都由衷地希望大家家庭兴旺发达，都愿意为之贡献力量。可以说，与地球村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相比较，大家庭式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有了更为牢固的基础、坚实的‘身体’和持久的生命力，共同体内的成员逐步形成充分的共同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愿意承担共同的责任。”

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不同文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谢迪斌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西方世界文明观的重构。D. G. 诺维科夫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揭示了世界除了相向而行和相互融合没有其他出路，而这一融合应该是在平等基础上实现的，而不是在某一方强迫另一方的前提下实现。”安德烈·卡托内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中存在着不同文化共存并进行动态交互的内涵，对所有彼此相互作用的文化给予相同的尊重和尊敬，将其视为人类的丰富财产。人类命运共同体并不是要实现一个消除所有差异的独特文明，而是把握所有文明的精髓，并在实现人类统一的道路上为所有文明提供支持。我们可以从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得出双赢合作协议的理论，旨在鼓励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尊重并重视各个国家的文化。”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范宝舟教授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要尊重文明的多样性、维护文明的平等性、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这是对“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文明隔阂论”、“文明威胁论”等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有力回应。山东财经大学冯道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重塑不同文明之间、不同国度之间的和谐关系，构建良好的国际生态，这对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尊重不同文明与资本批判之间并不矛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资本批判。安德烈·卡托内指出“命运共同体必须以对盲目地追求自身利益的资本主义的质疑为基础。”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陈广亮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不仅是一种“资产阶级上层建筑+资本”即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替代方案，更是实现奔向超越资本文明的“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选择，坚持资本批判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实现上述目标的根本要求。陈广亮指出，这并不是指它可以主观对资本进行随意裁撤，也不是指它能够忽视资本的存在，而是强调它在如何对待资本上，既重视资本在现代社会的暂时必然性作用，也突出对资本负面影响的科学疏导。“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尊重资本在人类向世界历史性发展上的基础动力作用，坚持从驾驭资本和占有资本文明中实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另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正视资本的内在矛盾和‘资产阶级上层建筑+资本’无力应对当代人类世界性发展的现状，精准把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新世纪持续发展的时代要求，立足资本批判，坚持从共同驾驭资本和成果共享中实现对其负面效应的科学疏导”。安德烈·卡托内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旨在实现人类统一的一条

道路上的两方面内容，这种统一无法建立在现有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必须改变现有的社会生产关系，摧毁最具侵略性的强权、资本主义的动物本能以及对利润的无限渴求。”

“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探索，经过历时五年夯基垒台、立柱架梁的基础性建设正在朝着落地生根、持久发展的阶段迈进，近几年在世界上持续产生重大影响，显示出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关注。

1. “一带一路”是新的国际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主任徐光春指出“五年来，‘一带一路’由理念变为行动，由愿景变为现实。从举办引发国内外巨大反响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到与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文件；从建设中老、中泰、匈塞铁路以及中俄原油、天然气管道等基础设施步伐加速推进，到金融合作不断加强、各类资本积极参与实体经济发展和价值链创造；从与沿线国家的贸易与投资合作不断扩大，贸易额显著增长，经贸合作区陆续建立，到多层次、多领域的人文交流合作日益密切，沿线民众互鉴互学、文化沟通不断深入，‘一带一路’建设在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效。”李慎明指出“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已得到百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参与，成为有关国家实现共同发展的巨大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将为推动更加均衡、包容和普惠的新型全球化注入持久的新动力，将为世界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徐光春指出“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及其核心理念，已被纳入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

我们应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共同发展增添新动力。徐光春指出“‘一带一路’成为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在国际社会受到热议和欢迎，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机构和国家表示将更全面、更深入地参与到‘一带一路’进程中来。诚如有国外媒体指出的，‘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和宏伟实践，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光明的发展前景。”李殿仁指出“现有的国际体系存在诸多弊端，霸权主义、强权主义、冷战思维等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相逆的思维、理念乃至行为方式还大行其道。特别是一些西方大国，经常将这些国际合作机制视之为维护本国霸权、谋取本国利益的平台。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制约，现有的许多国际合作机制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所能发挥的作用还相当有限。因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还应当根据现实需要和条件不断创新国际合作机制和模式。在创新国际合作机制和模式上，‘一带一路’是一大亮点。‘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在理念上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全相符。‘一带一路’不追求组织形式和权力关系，而是根据相关国家

的需要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聚焦构建互利合作网络和多元合作平台，完全是一种新型国际合作模式。”

“一带一路”重点面向亚欧非大陆，同时向所有国家朋友开放。与会专家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应重点布局亚欧大陆，由于中国与沿线国家有技术、资金、装备等供给与需求的对接，“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推动亚欧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抵御全球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弗·格·布罗夫提出“俄罗斯领导人非常了解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性，俄罗斯希望借助‘一带一路’倡议，将远东地区和亚太地区的贸易连接起来，为俄中两国发展战略的交流和结合创造良好机遇。”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李燕认为，乌克兰是欧亚大陆的中心和领土面积较大的国家，其在经济体量、国民素质、市场潜力等方面有优势，尽管乌克兰各界表达了参加“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望，但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与欧洲的交通基本上绕开乌克兰。土耳其社会主义研究学术协会国际关系处凯末尔·艾美、吉姆·克齐泽提出，土耳其积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作为股东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在“一带一路”框架内促成了一些大型物流和运输项目。格蕾蒂斯指出“拉美国家而言，‘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机会。拉美、加勒比国家必须加倍努力，与中国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金融合作，在出口产品中注入更多的价值和知识。”

2. “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挑战

“一带一路”建设是在中国主导下进行的，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重大影响。弗·格·布罗夫指出“‘一带一路’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级工程，因为它影响了亚洲和欧洲60多个国家，44亿人口。中国有巨大的投资能力，可以提供大量资金支持。”巴西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委员会研究员高欧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依赖于高度整合的中国能力。对于外围国家来说，基础设施工程由于数量多和技术要求复杂而难以完成。中国经济的闲置产能巨大，包括一个庞大基础产业：钢铁产量就是例证。中国是物流达人，其港口基础设施庞大，拥有世界十大港口中的7家，以及大型物流和铁路管理公司。中国已经调动其财力。”罗曼诺夫指出，中国在新常态条件下经济减速，特朗普政府对出口商品征收高税制约中国经济，“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仅仅寄希望于同西方国家发展国际贸易，对发达国家资金技术持开放态度，是没有前景的。周边伙伴国家经济和外交意义更加凸显，这其中有很多国家是‘一带一路’倡议落实参与国。在遭遇美国前所未有的施压政策后，中国需要向世界展示其对抗域外打击，同时保持自身经济稳定发展，杜绝经济增长降速的能力。在这种新的情况下，中国需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优势发挥到极致，以及及时将资源集中到优先领域，对遭受美国打击而衰落的企业和行业给予有效支持。”

“一带一路”建设具有两重性。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陈人江认为，“一带一路”的区域化战略固然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区域一体化，但也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阵营的经互会和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这些具有鲜明替代特点的一体化。包

括“一带一路”在内的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活动有两重性：有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现行规则秩序否定甚至超越的色彩，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维持甚至加强世界市场逻辑的重要一环，这给“一带一路”建设带来一些挑战。他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的许多投资项目是带有一定国家战略目标的，但作为实施和执行项目主体的企业是要服从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市场逻辑，尤其是国家鼓励私人经济主体的积极参与，其往往容易为追求一己之利而罔顾整体利益，如何平衡国家利益与经济主体的私人利益是一个新课题。“同样，以资本积累和逐利为主要特点的投资与‘一带一路’倡导的平等主义和合作共赢之间也会形成一定矛盾。例如，国内劳动力市场逻辑的输出，在投资对象国形成的新雇佣劳动关系，很多时候遭遇到了当地用工制度、法律和劳工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制约和抵抗，包括环境保护方面同样碰到了此类问题。而这种矛盾毋宁说是中国40年来的市场经济改革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手段和目标之间的逻辑张力在世界市场上的再现”。

尽管中国一再重申，“一带一路”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且超越地缘政治，但其对地缘政治产生的影响是客观的，也不能不受地缘政治的影响并承受地缘政治的风险。弗·格·布罗夫指出：“显然，‘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将对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美国霸权统治的单极世界将消失；国际社会将呈现多极化趋势——除了美国，还有中国、俄罗斯、欧盟、印度和其他国家，并达到新的权力平衡。实际上，这一进程早就开始了。”哈萨克斯坦中国和亚洲研究计划首席专家安同·布加延科指出“中国带着自己提出的倡议来到中亚地区，这一地区早已有成熟的地缘政治联系。中国并没有提出中长期地缘政治目标，中国项目的发展也不是沿着一体化轨道进行的，而且中国也没有明确提出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受限于地缘政治现实，中国无法推行更为激进的政策。”齐冰指出，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如何有效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中国倾向于用政府主导的方式，综合利用外交、执法、国企和军队等多方面力量达成目标（其中军事力量虽然并非主导力量，而是多用于具体任务的执行），也会动用武警等准军事力量并鼓励国营和私营安保公司等维护海外利益。他指出，这种混合模式不对他国构成威胁，但客观上会对地区局势有一定影响；有限的海外军事力量只用来打击那些威胁中国利益的势力，使用的方式也只会是小规模的精确打击；通过军事技术装备援助等方式会增加受援国对中国的依赖，也会影响他国的政治博弈。

“一带一路”建设还面临参与国复杂多样性的挑战。陈人江指出，中国面对的是迥异于自身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经济水平落差极大的诸多国家，且沿线的许多欠发达国家处于不稳定的安全局势和经济发展状态，再加上中国的综合实力尚未足以在这片广阔的欧亚经济板块中处于相对主导地位，这决定了“一带一路”建设推进过程中，经贸协定的达成及其他合作关系的建立更为困难，更易受到东道国之间和内部许多因素的影响，包括东道国是否真正理解和接受“一带一路”的价值理念，地区大国的势力范围和相关利益的协调能否达成，东道国国内的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具有怎样的政治风险，东道国执政精英是否足够强大或能否获得足够的社会

认同来提供政策支持等。陈人江强调，东道国具体的政治经济运行机制同样决定了本国底层社会群体能否确实从“一带一路”项目及其推动的工业化进程中获取最大利益，而这后一点恰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共享、共赢、发展”，从而赢得世界民心的关键。

3. “一带一路”助推新型全球化

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大力推进的结果，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既不公平，也不具备可持续性。徐光春指出“经过近40年的快速发展后，由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的弊端日益显现。由于跨国资本过度追逐利润增长，漠视经济发展的普惠性，造成世界各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国家间发展鸿沟加剧。而在受益于全球化的发达国家内部，由于巨额利润流向少数资本和技术所有者，也造成了财富分配不均和社会不平等扩大。近年来，受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困境、难民危机等影响，西方国家的治理问题愈益严峻。在民粹主义的煽动下，一些西方民众将自身面临的问题归结为参与全球化的后果，一时间反全球化、逆全球化声音甚嚣尘上，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日渐抬头、愈演愈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曹亚雄认为，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造成了严重不良后果“全球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穷国富国之间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可持续发展乏力；世界政局陷入动荡，战争威胁依然存在，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分裂势力影响日增，民粹主义和极右势力抬头；生态危机日益严重，全球生态灾难越来越明显；文化和价值观出现了巨大冲突，极端个人主义、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在全球蔓延，民族国家传统文化和价值被挤压、削弱乃至消失；社会分层固化，社会冲突加剧，公共安全和秩序遭到重大威胁，社会保障体系面临严峻考验，疏离、虚无和颓废成为一代人的生活状态。”曹亚雄指出“这种全球化违背历史发展的走势，把整个世界推向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各种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抬头，世界性的反全球化浪潮以及金融危机的持续表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已走上穷途末路，需要新型的全球化替代。”

新型全球化与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根本不同。曹亚雄对此进行了系统分析“资本主义全球化目的是实现资本的最大限度的增值，维护资本的统治和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压迫和统治，而新型全球化建立在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基础上，增进整个人类的福利，扩大人的视野，朝着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方向迈进；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不均衡发展，表现在各个领域的不均衡发展、国家、地区、阶级、阶层的不均衡方面，而新型全球化是一种真正的彻底的全球化，它实现了领域、国家、地区、各个阶级阶层的均衡发展；资本主义全球化由于自身的局限而最终无法坚持下去，而新型全球化消灭了制度障碍，具有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因而更能够追求一种彻底的全面的真正的全球化。可见，新型全球化也是新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超越和扬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必然趋势。”

在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受阻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以与其截然不同的发展理念和实践逻辑，为破解全球化的困境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中国方案。徐光春指出“实践愈发展，人们就愈将认识到，‘一带一路’作为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更好造福各国人民的最广泛的国际合作平

台，必将成为摆脱旧全球化弊病的制胜之道，以其所倡导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新理念，成为推动新型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引擎”。徐光春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可，是因为人们意识到这一倡议是解决当代世界经济难题，推动经济全球化持续、健康发展的切实有效的方案，以“一带一路”为新引擎的新型经济全球化将造就与资本主义主导根本不同的全球化，其结果是和平合作将唱响新型全球化的主旋律，开放包容是新全球化的精神支柱，互学互鉴是新全球化的发展动力，互利共赢是新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曹亚雄认为，作为推进新型全球化的战略性举措，“一带一路”给全球化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为新型全球化提供不竭的动能，从根本上克服了过去全球化的弊端，为全球化深度发展提供了新内容，以制度和法律来保障新型全球化的发展。

当前全球化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围绕两种全球化的斗争正在进行中。D. G. 诺维科夫指出“可以说，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和与之紧密相关的‘一带一路’项目，为世界提供了除由美国财团控制的帝国主义全球化以外的另一种方案和选择。”徐光春指出，“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些西方媒体所宣扬的“马歇尔计划”，也不是地缘政治的工具，更不是所谓中国的图谋，而是为不同国家、民族之间互联互通架构的桥梁，是要让更多国家搭上我国发展快车，帮助它们以我国发展为契机实现发展目标，其结果必然是世界各国间的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诺维科夫指出“中国今天为世界提供了全然不同于美国引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新方案。美国全球化本质在于不平等和剥削。在西方资本创造的精密体系下，西方国家得以从第三世界国家榨取资源。这些国家往往通过强迫别国签署不平等条约、操控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等金融‘恶魔’或公然干涉主权国家内政等途径达到上述目的。”埃贡·克伦茨指出“中国倡议原本是着眼于所有参与‘一带一路’国家福祉的平等关系，但是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这种倡议包含着社会主义的毒害，因此不能列入他们的议事日程。实际上，中国困扰他们的要素就是共产党。他们巴不得见到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但是我坚信，这是他们的痴心妄想。”

[责任编辑：孙立冰]